

中国发展经验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方法论的再审视

赵刘洋

摘要：重新审视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转型方式的差异，可以发现这和二者所依据的知识类型有着重要关系。后者所依赖的乃是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该理论希望能像经典物理学那样寻求关于复杂世界的普遍准则，进而确立一套普世性现代化模式。然而，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经济学无法复制物理学，这就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总是面临着违背真实和确立普遍准则的矛盾。与之不同，中国市场转型则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深厚的实践基础，构建自主知识不是从假设出发以构建普遍准则，而是从主客观二元互动的实践中概括行动者的真实行为逻辑，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对普世性现代化模式的有力反思，更是对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式主义认识论的明显超越。

关键词：普世性现代化；新古典经济学；中国发展经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 (2026) 01-0097-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如何解释中国发展经验则成为构建自主经济理论的关键。其核心在于，是将中国发展经验纳入西方主流理论中理解，还是承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此方面的典型争论就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学者，与林毅夫就经济转型方式的是非优劣所进行的辩论。萨克斯等学者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他们认为，在维持精英阶级政治垄断的条件下推行自由市场，政府服务质次价高，非政府部门被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剥削，市场容量小，总和生产力低。^①而在林毅夫看来，萨克斯等学者的上述观点实质上是为“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惨败做辩护，中国以渐进的双轨制方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种转型方式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中国市场转型方式是比“休克疗法”更为优越的转型方式。^②争论背后和学者们如何判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效果紧密有关，而这种分歧也意味着处理中国发展经验和西方主流理论关系的两种不同选择。本文重新审视中国发展经验的代表性解释，通过剖析这些解释背后所依赖的方法论基础，希望能为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借鉴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重点反思那种将中国发展经验简单归为市场转型的市场主义解释逻辑所存在的明显问题，这里所讨论的市场主义，主要是指那种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而将完全竞争性市场构筑为实现

基金项目：本文是202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百年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编号：2021EK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刘洋，男，法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

① J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3期。

②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

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唯一手段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实质上是一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观点。由此引出如何依据中国经济实践超越市场主义逻辑而构建自主知识，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主要是指构建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以下，我们将目光首先放回到中外学界关于中国发展经验解释的基本脉络上。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普世性现代化模式

国际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发展经验，与俄罗斯所推行的“休克疗法”的惨败有着重要关系。正如长期关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著名学者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所总结的，俄罗斯在转型中出现经济衰退严重和实际收入显著下降，中国却发展迅速，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中国经济发展理解为真正的成功故事，它使学界从之前对公司和产权的关注，转移到对经济增长之政治基础的思考。^①而俄罗斯所采取的“休克疗法”，其基本主张就是通过快速且激进的私有化，彻底拆除苏联社会主义政治架构，由此构建起一套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然而，结果却与这种预期明显背离：财富越来越聚积在更少数群体中，黑手党式的犯罪集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通货膨胀严重，数百万普通百姓的储蓄迅速消失，工资贬值，老人的退休工资降为零。^②什韦纳尔（Jan Svejnar）认为，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的经济表现完全是灾难性的，这种衰退来自多方面因素，包括降低国家补贴和实际利率上升所引起的企业信用紧缩、废除中央计划导致的产供销之间的组织混乱等一系列问题。^③总之，对盖达尔（Yegor Gaidar）等决策者而言，市场秩序可以通过制度移植就能自动建立，然而他们却忽略市场体系的建立和运作同样需要制度成本。因此，要理解学界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理论意义的讨论，首先需要剖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休克疗法”所依赖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所存在的明显弊端。

其关键在于，那种希望模仿经典物理学以构建普遍准则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其所秉持的乃是经典力学体系中关于无机世界的单一维度的世界观，这种单一维度的世界观实际上与人类社会中的主客观二元互动的实际明显不符，结果自然是概念不断实现精致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曼昆（N. Gregory Mankiw）指出，自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观察结果，即家庭和企业市场上相互交易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并导致合意的市场结果，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释看不见的手如何施展其魔力。^④经济学家的相应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完善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假设。斯密的理论建立在以下三个判断上：第一，分工提高效率；第二，人类行为激励来自自私天性；第三，个人追逐自我利益会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⑤这种市场主义假设乃是对人的行为所进行的简化和演绎，而伴随着英国成为霸主后在全球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市场主义假设也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信条。斯密的市场主义假设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以形式逻辑进行重新阐释，后者围绕地租、工资、利润、赋税等构建起一套经济学理论体系。^⑥李嘉图将实质要素排除于理论建构而实现逻辑一致性的做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深刻影响。李嘉图之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以综合视野构筑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由此开创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有可能采用精密方法进行分析，原因在于，经济学不是研究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感情，而是研究它们的外部表现，而感情和欲望就是成为人们活动的种种动力，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

① Andrew G. Walder(1995).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144(4), 963.

②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8版），杨烨、卿文辉、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6—618页。

③ [美]扬·什韦纳尔：《中国的转型表现：一个与其他转型经济比较的角度》，载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2页。

④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7版），梁小民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5页。

⑤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14，428，656—657页。

⑥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2，5—8页。

计和衡量，与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都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① 马歇尔以描述人的主观欲望的“效用”概念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限定于市场交换，据此发展出一套精致概念工具以分析市场交换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奠定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框架，市场主义假设开始在经济学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础性框架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创始者瓦尔拉斯（Léon Walras）所倡导的纯粹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完全自由竞争状态下确定价格的理论，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是以交换理论为根据，而交换理论则全部可以用市场均衡的双重条件进行概括，即各个交换参与者应取得最大效用，对每一种商品来说，所有参与者需求总量应与供给总量相等^②；阿罗（Kenneth J. 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reu）则延续瓦尔拉斯思路，构筑了一个更加精密的数学模型，希望利用更加精密的数学方法证明一般均衡状态的存在性，而这项工作也成为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依据^③。这一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希望从逻辑上证明完全竞争市场会自动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政府干预只会带来明显问题；由于这一高度形式逻辑化的理论明显缺乏实践，以科斯（Ronald H.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新古典理论扩展至对制度的分析上，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增加内容。在科斯看来，真实的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愿意交易的人从事于能带来交易成本减少的活动，对交易成本的最重要的适应性变化就是企业的出现。科斯以“交易成本”概念沟通新古典经济学与制度的关系，其延续的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主义假设。^④ 由此可以看到，为确立普遍准则，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围绕着市场主义假设，而将经济学窄化为一门仅是关于经济要素逻辑关系的学科。而构筑模型无论是用于说明经济机制，还是帮助人们进行定量计算，都是对复杂经济世界的高度简化，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学被简化为一门关于数量关系的经验科学。比如，将微积分中的“边际”概念引入经济学并对数理经济学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就认为，经济学就是关于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它本质上是一门关于量的科学，而经济学发展的困境就在于经济学家未能求取明白精确的效用与效用程度的概念，他希望以微积分的方式重新表述效用、价值、劳动、资本、供给、需要、利益等基础概念。^⑤ 对经济学家而言，数学语言在经济理论中的广泛使用推动经济学概念实现精确性，这种精确性意味着它主要关于数量关系且能被验证。

第二，经济要素间的复杂关系被抽象为纯粹逻辑关系。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础性框架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创始者瓦尔拉斯强调，经济学应该和天文学与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同时也是理性科学，他所倡导的纯粹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完全自由竞争状态下确定价格的理论。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是以交换理论为根据，而交换理论则全部可以用市场均衡的双重条件进行概括：各个交换参与者应取得最大效用；对每一种商品来说，所有参与者的需求总量应相等于供给总量。^⑥ 瓦尔拉斯之后，经济学家阿罗和数学家德布鲁构筑了一个更加精密的数学模型，他们希望从逻辑上证明“一般均衡状态”的存在性。^⑦ 经济理论以数学语言和方程式来表述，不仅意味着理论内部实现逻辑自洽，同时也希望表明这种理论具有普遍解释力，而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经济关系被简化为概念间的逻辑推演。

第三，纷繁复杂的经济增长机制则被简化为能够定量计算的数量关系。这方面的案例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Robert M. Solow）所构筑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增长模型试图证明，资本不是生产率增长的唯一来源，充其量是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为证明此点，索洛首先构建一个可以表明

①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5，29，53—54页。

② [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1—27页。

③ Kenneth J. Arrow, Gerard Debreu(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3), 26-290.

④ [美]罗纳德·H.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3，5—7，9—15页。

⑤ [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0—45页。

⑥ [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21—27页。

⑦ Kenneth J. Arrow, Gerard Debreu(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265-290.

不同年份和不同种类现存资本货物存量生产率的生产函数，由于人们对生产函数的期望是关于潜在产出，因此需要对潜在产出进行初步计算，为简化计算，索洛使用关于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过一系列复杂繁琐的运算和推演，索洛构筑一个能够计算出关于预期增长和将潜在产出提高到相应比率所需的第二年总投资比率的生产函数，而这一生产函数是人均储蓄、人均收入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均资本量的组合，索洛希望以此来描述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①索洛增长模型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人们对经济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定量估计，然而经济增长完全被视为与经济政策和制度无关的真空领域。

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中，经济事实被构建为关于数量的时间序列，数量关系则可被推导和验证，构筑的模型不在于假设是否符合真实，关键是能否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经济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基于这种市场主义假设，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简化为一套完全理性框架，这种框架以完全信息为前提，将人类经济行为放置于这种理性框架，创建了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边际分析和制度分析等一系列方法，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构建起精美的理论大厦。^②然而，这种在概念和模型方面不断精致化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却离真实经济世界越来越远，一生强调保护私有产权而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对主流经济学忽略对真实世界的关注而深感忧虑。^③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脱离真实世界的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兹所批评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在缺乏完全信息和获取信息需要成本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没有考虑在缺乏重要的风险市场和资本市场或两个市场均不完备的条件下可能出现的问题，这种竞争模型无法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提供真正有益的指导，对经济体制选择所提供的支持是极其有限的，这种模型完全未能考虑现实世界中的信息成本问题。^④总之，伴随“休克疗法”的失败，经济学家也开始反思这种高度形式主义化的经济理论并思考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意义。

二、中国发展经验研究中的市场主义逻辑

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转型方面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促使人们认真思考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意义：为何符合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的却是经济崩溃和转轨失败？为何那种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看好的中国市场转型方式却带来了经济迅速发展？由于学者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举措的描述不同，由此形成三大流派：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新结构经济学派、地方政府竞争学派。以下通过剖析三大流派如何解释中国发展经验，以此探讨其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

第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应解释。此派主要关注产权制度改革，认为产权清晰是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正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而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由此带来经济奇迹。如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即体制成本，经由改革得到大幅度降低，在农村变革进程中，降低体制成本的行为主体首先是农户和基层社队，改革重新划定集体经济产权的边界，使第一线当事人有权选用较低运行成本的合适体制。^⑤此派主要将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运用于中国发展经验的解释，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经济活力和增强经济主体的激励，由此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经济迅速发展。

第二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应解释。此派关注国家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从之前优

① Robert M.Solow(1962). Technical Progress,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2(2), 76-86.

② 何大安：《西方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边界拓宽及局限性》，《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③ [美] 罗纳德·科斯：《从经济学家手中拯救经济学》，《经济资料译丛》2013年第4期。

④ [美] 约瑟夫·E. 斯蒂格利兹：《经济体制转型：理论与证据》，韩太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5，12页。

⑤ 周其仁：《产权与中国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4—267页。

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转变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力扶持。在林毅夫看来，中国的改革通过这种谨慎和渐进的方式，市场逐步取代计划，既实现了经济增长，也保证了社会稳定。因此，林毅夫认为，在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时，必须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暗含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而这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并且有助于重新认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①新结构经济学希望依据中国经济实践，通过分析经济转型中结构变迁过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预设，以此构建一种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

第三大派别即“地方政府竞争学派”，此派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此派既关注到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又尝试修订西方主流理论的基本预设，因而具有较大影响力。一个代表性解释是“地方法团主义”理论。该概念由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戴慕珍（Jean Oi）提出，用以解释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和动力。在她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作用的结果，她将这种特征概括为“地方法团主义”。“地方法团主义”的现实基础在于，财政改革提供必要激励措施，中央财政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权力，并为地方官员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了强有力的动力，地方政府具有商业公司的许多特点。^②戴慕珍这一解释概括了地方政府与繁荣的市场经济共存的基本事实，以此展示中央财政改革是如何激励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经济发展。“地方法团主义”的重要启发在于，它将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的讨论从性质争论转移到功能分析上，由此深入反思那种将经济增长和私有产权紧密捆绑的观念。另一代表性解释则是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学者所提出的“中国式联邦主义”，这一概念同样希望概括中国市场转型的“悖论式”特征。温加斯特认为，“中国式联邦制”体系的建立为中国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还是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所具有的自主权，这种市场维护型的联邦主义正是中国市场转型的关键。^③温加斯特等学者这一解释，既考虑到中国市场转型的“悖论式”特征，同时又将这种特征纳入至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中进行解释，因而引发诸多讨论，成为海外学界中国发展经验研究的标识性概念。总之，以戴慕珍、温加斯特等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深入剖析地方政府在中国市场转型中的重要作用，重构理解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概念，这些研究在学界引发诸多关注，启发国际学界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经济改革所蕴含的重要智慧。

上述三大派别的重要贡献在于，这些解释皆关注中国市场转型本身的特性，并由这种特性出发而对西方主流理论有所修订，由此尝试构建一套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这种从实践到理论的研究路径，与那种从既有理论出发并由此验证西方主流理论的做法明显不同，它不是以事实证实或证伪西方理论，而是依据中国经济实践，与既有理论进行对话，从而修订西方理论的约束条件，以此扩展人们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认知，同时阐明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意义。

问题在于，上述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解释依然未能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主义逻辑。不管是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还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抑或地方政府竞争学派重视的依据市场主义逻辑运作的地方政府，上述三大流派所依据的依然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市场主义逻辑。市场主义逻辑的明显问题在于，它将中国发展经验单一地归结为市场化，且将构建一套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目标。因此，尽管这些解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有所修正，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将西方经验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样本和范例，未能真正呈现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逻辑。

更明显的问题在于，基于市场主义逻辑所构建的解释，往往未能充分考虑政治体制等实质性因素在经济转型中的独特作用，而且忽略市场失灵情形。比如，一直被视为中国发展重要动力的地方政府竞争，因为债务累积而激励不足，面临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至于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战略，也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的扩展，同样需要转变。总之，基于市场主义逻辑构建的解释中国发

①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典藏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2—136页。

② Jean C.Oi(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45(1),99-126.

③ 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 Barry R. Weingast(1995).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1),50-81.

展经验的理论，显然面临着因时代变化带来的关于适用性的质疑。那么如何超越市场主义逻辑，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自主知识体系？

三、超越市场主义逻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反思

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经济学前沿领域，如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诸多经济学流派，皆对新古典经济学与真实世界的脱离有着深刻批判。正如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新古典经济学所批评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然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事实，带来的结果就是经济学已经出现的严重贫困化现象。^①这种批判对学界超越市场主义逻辑以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具有重要启发。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个体基于理性选择必然带来社会理性，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指出这同样带来“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则是自由市场体制的关键弊病。在凯恩斯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不能代表实际生活中经济社会的属性，如果将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凯恩斯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就是“有效需求”，由此概念出发，凯恩斯构建起一套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所谓“有效需求”，即是令 Z 为雇佣 N 人时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则 Z 和 N 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为 $Z=\Phi(N)$ ，该公式可称为总供给函数；同样，令 D 为企业家雇佣 N 人时所预期的卖价，则 D 和 N 的关系可以写为 $D=f(N)$ ，该式可以称为总需求函数。而“有效需求”就是指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相交时 D 的数值，此时企业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化。古典理论假设总需求价格永远同总供给价格相等，但实际上“有效需求”不是具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无穷大且同样可被容许的均衡值。因此，应对失业问题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干预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②这种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以应对市场失灵问题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曾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皆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内部同样正视真实世界中的风险和成本约束问题。第一，主流经济理论假设市场中的人都是无差别的“理性人”，这首先意味着人们获得信息的能力是无差别的，而信息经济学主要创始人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关于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的研究表明：市场中的人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只有由信息不对称出发，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机制的运作。^③第二，主流经济理论假设市场中的人都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人”，这就意味着个体决策具有稳定的心理预期和偏好，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学者则将心理学方法引入到对人们如何做出决策的基本事实的分析上，这些研究明显修订主流经济理论关于“理性人”的假设。^④第三，主流经济理论假设市场竞争是在完全确定状态下进行的，而阿罗则将现实世界中人们对承担风险的考虑引入经济学理论，从而修订了经济学家关于完全确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预设。^⑤阿罗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考虑对行为决策的影响出发来理解市场运作机制，启发经济学家应该将人们对风险的预期纳入假设。上述研究表明，通过修订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市场主义假设，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理解真实经济世界。

由此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市场转型方式和效果的明显差异提醒人们：应该依据经济实践本身对市场主

①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玉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15页。

②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3，15，17—19，21—23，30—31，258—259页。

③ George A. Akerlof(1970).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3), 488-500.

④ Amos Tversky, Daniel Kahneman(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1124-1131.

⑤ Kenneth J.Arrow(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义预设进行深刻反思。对此，蒂莫西·弗莱（Timothy Frye）和安德烈·施莱费尔（Andrei Shleifer）对比波兰和俄罗斯政府行为的不同作用，颇具启发性地提出政府行为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掠夺之手”，在这一模式中，政府由大量各自为政的官员组成，他们追求个人私利包括接受贿赂，且很少受统一的公共政策指导，并对商业实施各种掠夺性的规定；另一种则是“帮助之手”，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官员积极参与促进私营经济活动，他们支持一些企业并淘汰其他企业，由此推动产业发展。^①由此，构建自主知识不是将既有理论作为答案以指导实践，恰恰相反，而应从实践出发，构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这种从真实世界出发以构建理论的研究进路，明显不同于从市场主义假设出发以尝试确立普遍法则的做法，后者主要不足在于，它将社会经济建立在完全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过于特殊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这就导致高度形式逻辑化的理论往往成为和现实世界无关的逻辑推演。相反，从实践出发以建构理论，依据基本事实以修订假设，因其对现实世界的分类更加趋于一般性，实质上扩展了理论的解释范围。所以，构建自主知识不是将事实削足适履地纳入主流理论框架，而是通过对最基本事实进行深入分析，由此重构理解中国经济的关键概念。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中进行检验的研究进路，对于构建自主知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自主知识构建的可能路径

已有诸多学者通过总结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经互动模式，希望整合政府和市场关系。例如，周黎安以“官场+市场”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机制，揭示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内部的政治激励、外部的市场约束和必要的信息反馈，这一模式的有效运作则高度依赖于全国范围内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良好秩序和有效规则。^②以周黎安为代表的相应学者，通过分析政府层级、官场竞争、官员激励到市场竞争和中国经济的双向影射关系，目的在于内生性地解释地区层面政企关系和经济发展的差异。

但是，这种解释同样存在不足。第一，该解释并不是基于对新的重要经验事实进行深入研究形成的新的概括，因而该解释实质上并未真正超越现有争论；第二，该解释对经济转型中的相应问题重视不足。比如，该理论强调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所展开的竞争带来经济奇迹，问题在于，此种竞争同样带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进行大规模融资所导致的自身债务迅速扩张等问题。^③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意味着研究者应在经验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意味着这种知识能够带来前瞻性启发。

在笔者看来，依据实践构建理论较为成功的案例是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以下通过剖析“内卷化”理论的构建方式，以期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启发意义。

第一，“内卷化”概念主要基于经济史研究，用以区别通过密集化劳动推动产量增长（内卷）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增长（发展）的差异，从而希望揭示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一概念后来被进一步扩展，原因在于它深化了人们关于经济增长机制的认知，尤其是引发人们对高度同质化竞争引发市场机制扭曲的增长路径的深刻反思。在黄宗智看来，明清至近代江南地区的商品化和人口压力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该地区商品化的内在动力并非是追求利润，而是源于人口压力下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产生的需求。原因在于，该地区人口和土地之间压力过大，单一依赖种植水稻和棉布生产都难以维系生存，必须紧密结合二者。因此，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经济长期陷入“内卷化”状态，尽管有量的增长，但无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农业经济逐渐走出“内卷化”，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化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④这一概念乃是对具体经济实践的概括，它和那种将市场化视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普遍法则的理念明显不同，由此深刻启发人们应该认真思考经济增长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① Timothy Frye, Andrei Shleifer (1997).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2), 354-358.

② 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社会》2018年第2期。

③ 刘伟、陈彦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④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63—365页。

第二，这种解释关注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现实下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从而将人口等关乎经济发展的实质性因素纳入理论框架。这种强调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关键的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强调激励机制的改变带来农业经济增长的观点明显不同。林毅夫就认为，激励机制的改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而在1978—1984年间，农作物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42.23%，其中一半来自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①而“内卷化”概念则提醒人们，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和具体环境紧密相关。与黄宗智类似，费孝通于1983年就曾以上海郊区的莘塔公社集镇为例，说明乡镇企业在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当时的社办企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吸纳了当地近1/5的农村劳动力。^②费孝通提到莘塔公社的情况在苏南地区较为普遍，这些企业在吸收劳动力、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如火如荼的乡村工业化虽然吸引了海内外诸多学者的目光，但多数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乡镇企业产权创新，这也说明西方理论的强势支配地位。而在黄宗智和费孝通等学者看来，乡村工业化代表一种新路，它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是充分考虑人多地少的基本现实。总之，关于如何走出“内卷化”的讨论，重点探讨的是在人多地少的基本现实下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由此反思那种忽略具体情境而将市场化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普遍准则的理念。

第三，“内卷化”概念并未止步于对历史经验的回顾，这一概念主要剖析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机制，因而具有较为广阔的解释力。比如，今天中国乡村工业化呈现一种新的模式即“淘宝村”，而按照阿里研究院的相关统计标准，“淘宝村”是指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正如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所分析的那样，这些“淘宝村”的主要特点是，它们专注于大众市场，发展出具有特定需求的单一廉价产品，在不同细分市场中提供有特色的和有价格优势的商品。^③乡村工业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和数字经济以及全球贸易紧密融合。而“内卷化”主要描述的是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过剩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主要利用的是廉价的生产要素，在当前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和人口生育模式发生诸多变化的情形下，“淘宝村”这种发展模式同样需要转型升级。

由此可以看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依据实践，深入反思既有理论的基本预设，并在具体情境中重构那些认识中国实际的关键概念，具体而言：

第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拒绝新古典经济学对复杂经济世界所进行的那些符合真实的抽象，它也不拒斥具有明确经验限定范围的概念演绎，它所反对的是那种未经反思就将市场主义假设视为普遍真理的做法。显然，新古典经济学为观察经济世界提供一种视角，它不会也不可能提供能够适应于任何情形的标准答案。

第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尝试确立某种普遍准则，而是帮助人们更好理解真实世界。这就要求研究者应该关注实践中那些真实的重要事实，通过对重要事实展开深入分析，由此和西方主流理论展开对话，从此角度而言，构建自主知识同时也是经验和理论如何实现紧密连接的过程。

第三，自主知识是一种在具体情境中生成的知识，这种知识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弱目的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深刻反思将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逻辑演绎为一套普遍法则的做法，因而它不会像西方主流理论那样，假设一种因素出现后另一种因素必然出现，以此再把事实削足适履去验证既定理论。恰恰相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所强调的乃是从实践到理论再返回实践检验，所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违背真实以确立某种普遍法则，它关注的乃是具体情境中的人的理性抉择。这种从真实世界出发以构建理论的做法，显然是更加符合探究人类社会实际的研究进路。

概括而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那种希望确立普遍法则的形式主义认识论明显不同。深受科学主义

① Justin Yifu Lin(1992).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1),34-51.

②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1983—1996）》（合编本上），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第46—48页。

③ [美]巴里·诺顿：《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0—321页。

影响的经济学,希望能像经典物理学那样寻求到关于复杂世界的普遍准则,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经济学概念成为关于数量的时间序列,复杂的经济实践被简化为抽象概念间的逻辑关系。这种进路的最大问题是它忽略了经济世界与无机世界的明显差异,显然,经济世界不可能具有无机世界那样的确定性和同质化,现实中的人的抉择也不可能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从假设出发以构建普遍准则,而是从主客观二元互动的实践中概括行动者的真实行为逻辑。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违背真实以确立某种普遍真理,它所关注的是那些真实经济世界中的紧迫性问题,而不是主要回应西方主流理论所关心的问题。这种从中国实际出发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进路,不仅是对普世性现代化模式的有力反思,同时也是对形式主义认识论的明显超越。

四、结 语

重新审视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转型方式方面的差异,可以发现二者所依据的知识类型有着重要关系。后者所依赖的乃是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理论希望寻求关于复杂世界的普遍准则,在这套理论中,经济概念成为关于数量的时间序列,复杂的经济实践被简化为抽象概念间的逻辑关系。然而,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经济学难以复制物理学,这种知识路径的最大问题是忽略经济世界与无机世界的明显差异。而“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惨败带来深刻反思,那种违背真实以构建普遍准则的研究路径存在明显缺陷。

与之不同,中国市场转型则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深厚的实践基础。构建自主知识不是从抽象理念出发,并将某种既定理论作为答案以指导实践,而是紧密连接经验和理论,由此概括行动者行为逻辑的进路,从而认识真实的中国实际。因此,自主知识往往具有自发性和弱目的性,却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实际的知识。而构建自主知识也深刻启发人们,理论的关键意义并不是违背真实以尝试确立某种普遍法则,而是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真实世界。事实上,只有这种求真求实的学术,才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

On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 Re-examination of Methodology

ZHAO Liu-yang

(School of Marxism & Overseas CPC Research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A re-examin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pproach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reveal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types of knowledge they rely on. Russia's approach is grounded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which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scientism and seeks, much like classical physics, to identify universal principles governing a complex world and establish a universal model of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 inherent uncertainty of the real world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economics to replicate the methodologies of physics, resulting in a persistent contradiction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between deviating from reality and establishing universal principles. By contrast, China's market transformation has laid a robust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Rather than starting from abstract assumptions in order to formulate universal principles, this approach derives knowledge from practic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summarizing the actual behavioral logic of actors. Consequently,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represents not only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universalist models of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 clear transcendence of the formalist epistemology that has long dominated the field.

Keywords: Universal Modernizatio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Constructing Independent Knowledge

[责任编辑: 张莺译、谢雨佟]